

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业态变迁

杨 昆 李向民

摘要: 科技创新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与文化的共同驱动,文化科技融合又是文化业态变迁的核心动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业态变迁呈现出主体转换、周期变迁、类型变化和路径变迁等不同表征。文化与科技相互作用,促进了文化业态的迭代和共生。在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系统下,创意、资源、生产、消费和场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创新群落,能够赋能文化资源开发转化、文化生产变革、文化表现形式创新、文化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融合,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业态变迁路径。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赋能,对文化业态造成重大影响。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化业态变迁,对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转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科技融合; 新质生产力; 文化业态; 文化资源; 科技创新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4.004

文化业态的创新源于不同时代的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力,也改变了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①新质生产力对文化业态的影响,揭示了科技革命在新时代作用于文化业态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创新命题,影响创新的社会条件随时间发生变化,也随着不同的生产性互动而变化。因此,对创新理论分析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文化业态变迁是新技术、新内容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持续产出新产品、新服务的过程,表现为文化资源、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传播交易、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创新,是新旧业态的迭代和共生。“艺术与技术原是不可分的。我们考察古代遗留的器皿,如石器、石斧、玉器、铜器上均雕有工细的花纹,形式亦非常优美。这些玉器、铜器又同时多半是宗教上用的礼器。”^②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深化,文化与科技逐渐形成独立发展路径,衍生出技术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学说。当前,在产业升级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驱动下,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文化业态不断创新的核心动力。

一、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文化业态的变迁脉络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开始了真正的分工^③。此后,以满足精神文化需要为目标的专门化精神生产催生了文化产业。随着科技进步推动生产技术发展,社会分工逐步深化,生产方式和生产组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文化产业业态变迁与政策优化研究——以用户生成内容UGC为例”(23BH163);江苏省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时代江苏文化业态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21YSC010)。

作者简介: 杨昆,南京财经大学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紫金文创研究院副研究员(南京 210000; yangkunapple@126.com);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南京 210000; pacphd@126.com)。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② 《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织形式随之发生演变,促使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演变,文化业态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历史阶段^①,各历史阶段呈现出具有显著差异的变迁特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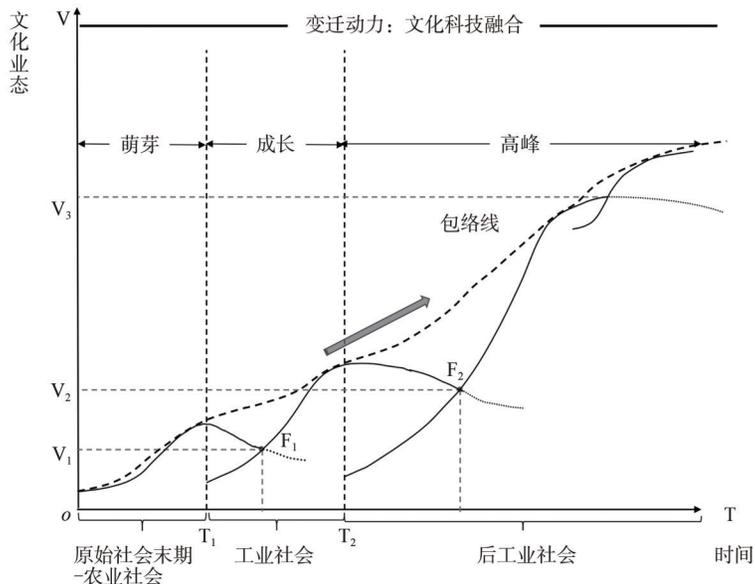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业态的变迁示意图

（一）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社会时期

在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社会时期,科技创新对文化业态的影响呈现阶段突破式特征。此阶段文化业态创新缓慢,文化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原始社会末期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使得文化生产者逐渐从普通农业劳动者中脱离出来,形成专门从事文化生产的独立阶层。《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自先秦时期便存在以“梓人”“玉人”“雕人”“鳧氏”“鞀人”“磬氏”“画绩”“鍾氏”“桴氏”等为代表的专事礼乐饮射之职,以“匠人”为代表的专事王城规划、建筑设计,以“陶人”“旒人”为代表的专事陶瓷设计制作的文化生产群体^②。每一类劳动者的独立,都标志着新兴文化业态的形成。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出现了专门从事“珠玉犬马”商品交易并“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的商旅群体,逐步构建起成熟的商业模式。此阶段的文化业态创新依托社会分工体系,各细分行业遵循传承、积累与技术改进的发展规律,从而产生了精湛的工艺技术。例如书画业、书籍出版业等行业的勃兴,便与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突破密切相关。

（二）工业社会时期

在工业社会时期,科技创新对文化业态变迁的影响呈现颠覆式特征。文化生产一旦与科技结合形成产业体系,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的巨大力量^③。18世纪60年代以来,蒸汽动力与电力引发的两次工业革命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使得文化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转型,文化生产方式、文化生产组织形式、文化需求及文化消费市场均发生了系统性变革。产业的细分化、规模化引发文化业态集中创新,导致传统文化业态断崖式走向衰退。工业社会中技术的迅速发展可以被视为社会变迁

^①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概念,他根据人类的科技发展和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矛盾变化,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②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16页。

^③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134页。

的见证,其建设性和破坏性推动着商品的生产和消灭^①。摄影技术与光电技术结合、无线电半导体的发明等,催生出电影、广播、电视、摄影、磁带录制等新兴文化业态,颠覆了西洋镜、广场说书、肖像画、唱片等传统文化业态,同时也重构了文化生产组织形式,从瓦肆勾栏转向电影院、演播厅、影棚,从家庭式作坊转型为流水线工厂。机器生产特有的复制性与规模化显著提升了文化生产效率,扩大了文化受众群体规模,拓展了文化传播范围。以电影产业为例,从默片到有声片、黑白到彩色、胶片到数码、平面到3D甚至智能动感,其业态变迁依赖声音磁盘、特艺七彩、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推动。与此同时,电影呈现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内容持续丰富。

(三)后工业社会时期

在后工业社会时期,科技创新对文化业态变迁的影响呈现融合式、生态式特征。信息与数字技术构成此阶段文化业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催生了文化生产逐步向电子化、信息化及数字化转型,推动文化新业态迅速发展。文化产业逐步汇聚人才、资本及政策要素,并依托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创新,构建起多维度协同的文化生态创新系统。文化产业已突破传统行业壁垒,通过赋能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实现“破圈”融合,创造新的供需关系和生产经营模式,形成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制造、创意农业等新兴业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文化新业态的主要特征,业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文化新业态营业收入连续提升。2023年,具有显著科技创新属性且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2395亿元,同比增长15.3%,是2019年的2.64倍,同期增长速度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1个百分点^②(详见图2)。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形成的新质生产力,也再次证明技术手段和传播介质对文化业态创新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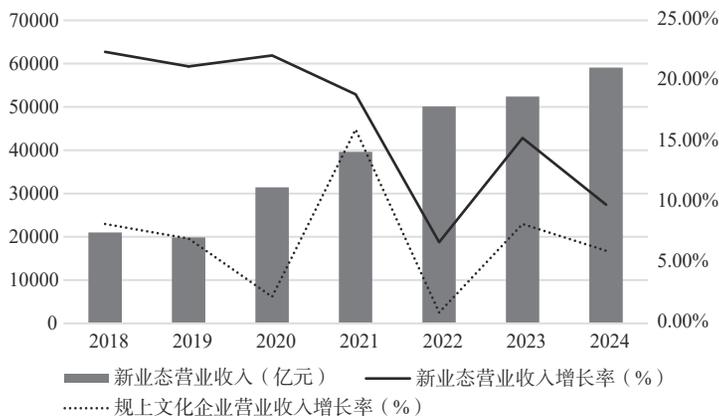


图2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新业态企业营业收入变化(2018—2024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二、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文化业态的变迁表征

历史上,文化业态的变迁是生产者、组织者与消费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通过将前沿科技在文化领域应用转化为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新业态不断形成。

(一)文化业态创新主体的转换:工匠与企业

不同技术条件下,创新主体随之转换。农业社会时期,限于科技开发的资源依赖和稀缺性,文化

①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②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9147.htm,访问日期:2025年2月10日。

业态创新主要产生于皇家组织的文化生产体系。由于贵族文化需求及审美趣味提升与工匠落后生产技艺间的矛盾,文化创新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初期文化生产大量供给礼乐、贵族等具有特殊意义和专门适用场景的私人订制型文化产品及服务,工匠为了满足这类文化需求,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升技艺,从而推动了业态创新。工业社会时期,机器设备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促使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组织结构产生颠覆性变革。由于科技创新的资金依赖和机器设备所有权限制,业态创新主要转移至大资本家、大企业主等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科技进步层出不穷,文化业态进入快速发展期,但资本同时也成为约束先进生产力应用的主要因素。工业社会时期,源自大众的文化业态创新开始爆发。生产力提高带来物质资料的剩余,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去追求更多社交、礼仪的生活^①,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文化娱乐不再是贵族专属,大众文化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推动文化业态创新的主导力量,文化业态的创新呈现阶梯式增长态势。

在后工业社会时期,信息技术与文化领域的全面融合推动生产力加速提升。互联网凭借其易于突破空间限制、消解文化隔阂、跨越语言差异等特征,逐步成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接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出未来产业形态。随着一批活跃的互联网平台型领军企业的崛起,大众文化逐步取代精英文化,成为文化市场的主流形态。数字文化产业也成为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科技平台型企业群已演变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创新活动开始呈现去中心化趋势,由单一企业掌控特定技术方向的格局逐渐瓦解。平台型企业群基于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迭代,围绕应用场景与文化的融合创新,构建起“平台+内容+应用+终端”的开放式生态系统,成为文化业态创新的核心动力。例如,阿里巴巴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与文化内容深度融合,在其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两大平台的强势支持下,通过大量的企业并购与联合实现了跨产业垂直整合,打造出阿里大文娱生态圈。

(二)文化业态变迁过程的变化:周期性云集

文化业态的变迁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变革、消费市场培育程度等因素的支配,其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成长、成熟、衰落四个阶段,遵循生命周期规律^②。以电影产业为例,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次年电影拍摄、放映技术逐步开始扩散。从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问世至1923年间,中国电影产业处于黑白电影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呈现出行业分工模糊、生产规模有限、影片产量偏低等显著探索性特征。1923年至1938年,中国电影产业进入成长期,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逐步构建,影片数量上升趋势明显,同时迎来资本的大规模进入。1939年至1943年属于黑白电影的成熟期,影片数量稳定维持在较高水平。然而,随着彩色电影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三原色加色法、二色减色法、染印法等技术的不断研制,1935年第一部彩色电影公映,由此引发了产业变革,彩色电影作为新业态进入萌芽期,而黑白电影成为传统业态由成熟期向衰落期过渡。历经40余年,电影产业首度完成生产技术驱动的业态更迭。在中国市场,彩色电影产量于1970年首次超过黑白电影。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白电影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仅存少数电影爱好者将其视作艺术实验载体进行创作保留,例如“复古运动”“新浪潮”等。如图3所示,随着时间推移,电影产业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逐步从黑白电影转向彩色电影的技术轨道,从而推动技术改进和业态发展。无数具体文化业态叠加,形成了文化业态的整体变迁趋势。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到如今的后工业社会,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文化业态数量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各历史时期基于生产力发展阶段,又呈现出不同文化业态从萌芽、成长、成熟到衰落的变迁规律。

文化业态的创新速率并非恒定不变,其变化始终受到文化思想和科技创新的影响。历史上每一次密集的文化业态创新,必然伴随着重大的科技进步。而每轮重大科技进步来临之前,往往都有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解放运动帮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思维定式,激发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索未知领域,从而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体系^③。科技发展兼具连续演进和不连续突变的双重特

①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页。

② William R., Albert D., Stephen J., "The Retail Life Cyc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76, 54(6), pp. 89-96.

③ 祁述裕:《培育新质生产力: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

征,在与文化融合创新时,使得文化业态变迁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文化业态的创新蜂聚在重大科技突破之后的阶段,形成周期性跃升发展。简单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五次文化大发展时期,分别是周至先秦的诸子百家时期、北魏至唐的儒释道思想融合时期、北宋至明的宋明理学时期、五四运动后的近现代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五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发展都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跃升和文化新业态爆发形成历史性共振。从旧石器时期至今,人类的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集中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见图4),也是文化业态创新爆发的重要时期(见图5)。公元前2000年,数学发明至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顶点标志着文明古国时期社会生产的繁荣,同时期中国夏商周至先秦经历了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潮,加上青铜、冶金、农耕、制陶、纺织等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中国文化业态的第一次爆发。北魏至唐时期,印度哲学经典进入中国,引起儒释道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同时雕刻造像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业态的第二次爆发。宋至明时期,宋明理学的思想引起社会对文人的重视,同时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算术体系的发明,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业态的第三次爆发。此阶段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的人文精神也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人口数量迅速提升,戏院、茶园等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业态也逐渐超越宫廷文化活动成为发展主角。20世纪之后,中国与全球同步进入人口数量垂直上升阶段,文化业态也进入同频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通过科技创新获得了空前的环境控制能力,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各国经济发展先后进入“昂起阶段”,市场供给以创新驱动,需求以文化驱动,消费者更加注重文化消费^①。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理念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也促使中国文化业态创新进入第四次爆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文化业态发生了第五次爆发。科技创新形成的业态均衡,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每次的文化业态创新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才会形成新的稳定状态。文化生产会沿着文化创新选定的技术方向发展,在一段时间内,转移到其他技术路径的难度增加,打破这种业态均衡则需要很高的成本^②,形成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因此,行业中的业态创新大多由资本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先者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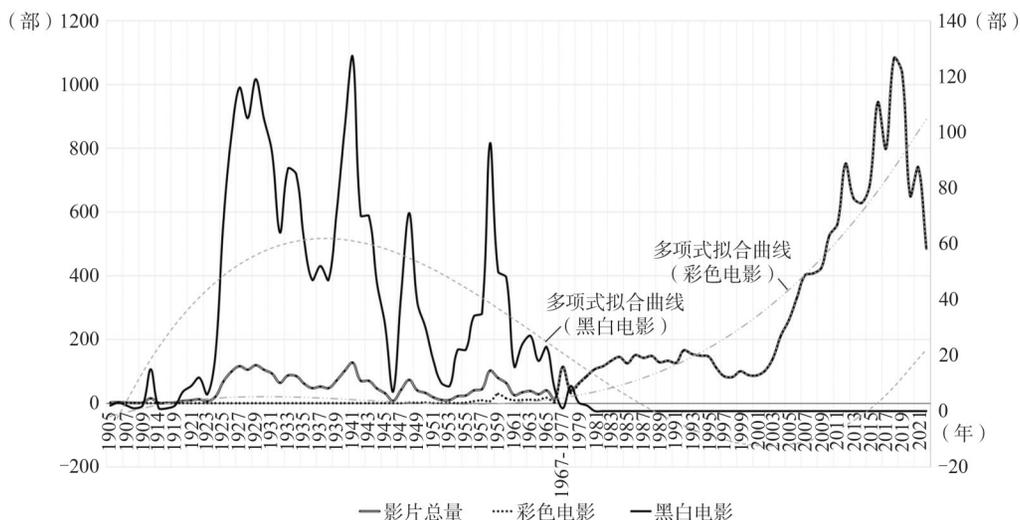


图3 1905—2022年中国黑白、彩色影片数量^③

① 李向民:《新时代:加速崛起的精神经济时代》,《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4), pp. 116-131.
 ③ 由于产业发展并非线性关系,所以根据影片数量做了多项式趋势线分析。详见杨昆:《中国早期电影业投融资研究(1905—1937)》,南京: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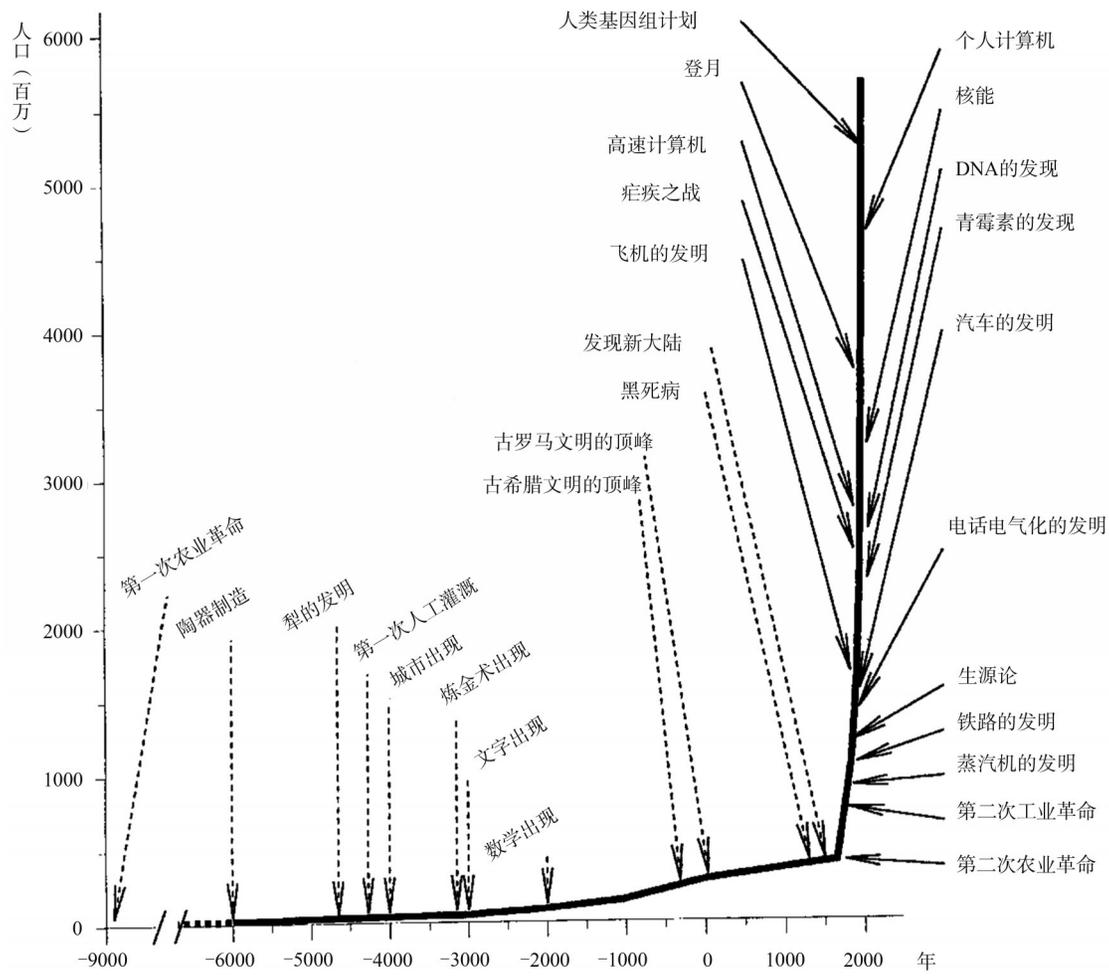


图4 全球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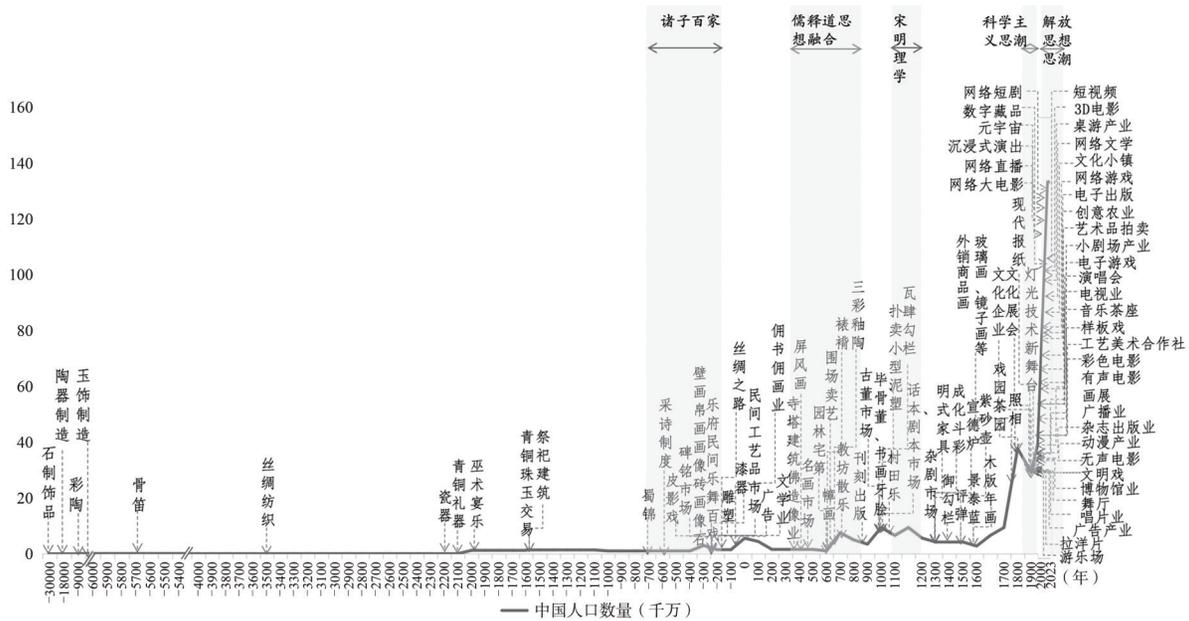


图5 中国人口增长和文化业态变迁的重要事件

(三)文化业态变迁的类型:迭代与共生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质上是技术不断迭代、业态不断创新、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结果。作为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新质生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文化业态的创新与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分为根本性变革和改善性变革两种。根本性变革源于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创新,即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一种新技术与文化相结合,会产生新的文化内容和新的产品。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会替代消费者同类型文化消费的满足,从而逐步淘汰传统的文化产品。成功的发明者会沿着质量维度消除或“摧毁”前人的垄断租金。根本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业态变化是颠覆性的,是文化产品从无到有的创新,是旧的技术路径被新的技术路径替代,以及传统业态的消亡和新业态的兴起。例如,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结合创造了网络游戏,数字电影取代了胶片电影等。文化需求、政策制度等创新环境的不断完善会推动科技创新的加速发展,业态更迭的拐点会因技术更新的加速而提前到来。例如,电子游戏迭代不断加速,周期越来越短。

改善性变革源于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改进。这种变革区别于一般物质产业的成长周期规律^②,其特征是在提升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方式的同时,维持原技术路径的持续性,并不引起文化内核的变化。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内容更丰富的表达和传播,实现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的共生。工业社会时期,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手工劳动,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新业态在传统业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力、生产方式或组织经营方式的改变,挤压了传统业态的生产时间和市场空间。但文化的传承性导致传统业态逐渐衰退,部分业态沉淀为趋于平缓、稳定的发展状态。两次文化业态更迭时期交汇后,前一阶段的文化业态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在急速下降后趋于平稳。例如,大众文化的兴起降低了文化产品的平均价格,但并未导致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精英艺术的消解和衰落。传统的文化业态被选择性保留,与新业态共存,成为新业态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少数人的“阳春白雪”。传统手工刺绣与机器刺绣、剧场演艺与视频录制等共存就是很好的证明。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创新环境滞后于科技创新会导致传统的手工刺绣加速衰落。当创新环境得到改善后,传统业态因其强大的文化内核和难以被复制替代的工艺品质,又会得到社会重视和政策保护。当创新环境和科技创新达到平衡时,文化业态创新的拐点出现,文化产业会迎来新一层级的增长。新技术的迭代虽然不会完全替代传统业态,但会影响其利润流。例如,3D摄影技术的出现并不会瞬间替代2D电影,但市场会给予新兴产品、新业态较大的利润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使用3D摄影技术拍摄的电影《阿凡达》的票房收入高达28.47亿美元,在2009年上映时成为全球电影票房榜首,是票房排名第二位的3倍多。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业态创新的策源地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但随着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被缩小,新质生产力发展后来居上,在未来产业的发展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由此产生的文化业态创新也受到全球的关注,如中国的TikTok、小红书、微信、DeepSeek等。

(四)文化业态变迁路径:单向线性与集成系统

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从单向线性到集成系统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技通过改造文化生产工具、提升效率与规模实现对文化的单向赋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早期,关键性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文化生产工具的开发上,例如造纸、制墨、陶范、印刷等,是人类器官的延伸。技艺演进主要依靠劳动者个人技能,文化业态的变迁呈现科技创新主导下的线性特征。此阶段的文化产业从业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社会阶层归属。北魏时期创立的“乐户”制度,将获罪之人罚没为乐户,致使声乐伎艺从业者成为特殊户籍群体,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明代开始实施严格的军籍、匠籍、民籍

① Fogel R. W.,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1), pp. 1-21.

② 傅才武,陈赓:《技术变迁、行业概念更新与文化行业体制重建——关于建立中国大文化体制的理论反思》,《艺术百家》2013年第5期。

制度,职业世袭,永不更改,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文化业态创新基本是延续、传承者较多,“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①。创物、传承到世代遵循,便是最早的文化业态形成流程。由于早期文化生产的技艺通常是“口传心授”“口耳相承”的父子或师徒活态传承的方式,学习与生产主要依赖于传承人的传授,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从而导致文化业态创新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因此,此阶段的文化创新很难进行颠覆性创新,多数停留在技艺的改进和完善层面。

随着工业革命爆发,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引发生产关系变革,文化业态的变迁显示出创新资源集聚的多样性特征。大规模生产设备的发明成为人体器官的强化延伸,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摄像机、放映机、音箱、复印机等机械的普及,使文化产品成为一种流水线产品而向大众传播,推动了电影制片厂、出版社、音像公司的快速增长。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文化业态变迁存在典型的“科技创新—生产实践—知识溢出—模仿复制—产业化”线性路径。鉴于科技创新的高成本、文化创新的高风险、文化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知识产权的制度保护等原因,创新壁垒的形成使得引领文化业态的创新始终集中于少数科技创新所有者,即行业领先主体。这些主体包括自然人、行会组织以及企业等,凭借生产的“先发优势”迅速占据市场。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垄断可以激励创新。科技创新能够集聚创新资源,大企业具有在行业空间中重组分散资源从而增强此空间超越周围环境的能力,因此在创新方面更具优势。先发优势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极强的传播性、扩散性和可复制性,对采取跟随战略和细分市场策略的后来者也是极其有利的。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知识溢出的公共属性,后来者的生产路径转换成本较低,更易实现生产技术跨越。中小型文化企业根据其自身优势在文化和技术融合中不断创新完善、自我强化,提高产业效率,进行产品或服务的升级迭代,形成三种不同的业态创新链^②。第一,后来者在复制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入文化内容元素完善创新,通过文化产品迭代形成业态创新。例如,3D打印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于医疗行业的骨科治疗,随着技术溢出已被广泛应用于文创产品、影视动漫等领域,创造了新的业态。在新业态的基础上,博物馆行业将特有的文物资源与3D打印技术深度融合,成功实现龙门石窟造像“移动”展出、临汾残缺古塔复原等创新实践。第二,后来者在复制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通过文化生产的技术迭代、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推动文化业态创新升级。例如,QQ对ICQ的改良,TikTok对YouTube的突破等,许多文化业态的兴起源自行业领先主体的科技创新,在转型模仿的过程中通过市场适配与个性化算法优化等二次创新,逐步形成稳定的文化业态。第三,后来者通过降低研发成本和人工成本、追求规模经济,以低价策略迅速占领部分市场份额,形成技术低端锁定,完成文化新业态市场分割。例如,品牌服装新品的跟随式量产,电动汽车行业的设计跟随等。

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阶段,随着物质经济迅速发展与精神需求升级,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开始转向双向、多维的系统化融合,成为文化业态创新的核心动力。此时的文化业态创新受到多因素协同作用,需要企业、中介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等主体间的合作,集合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人才资源、资金,并且和制度相互影响,从单向线性路径转化为相互并联的创新集成系统。

三、从文化业态变迁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2024年3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③文化业态创新需基于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通过先进的文化生产力打通业态创新的关键环节。文化业态变迁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在文化领域的应

①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修订本),第1页。

② 杨昆、李向民:《科教赋能国有文化企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③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321/c280965e8ddd41ff9659dbeb0d9e51b6/c.html>, 访问日期:2025年2月9日。

用,其本质在于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产业化实现。文化业态变迁过程中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体现出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转化赋能。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通过资源开发、生产变革、形式创新、消费需求变化及产业融合等路径,最终实现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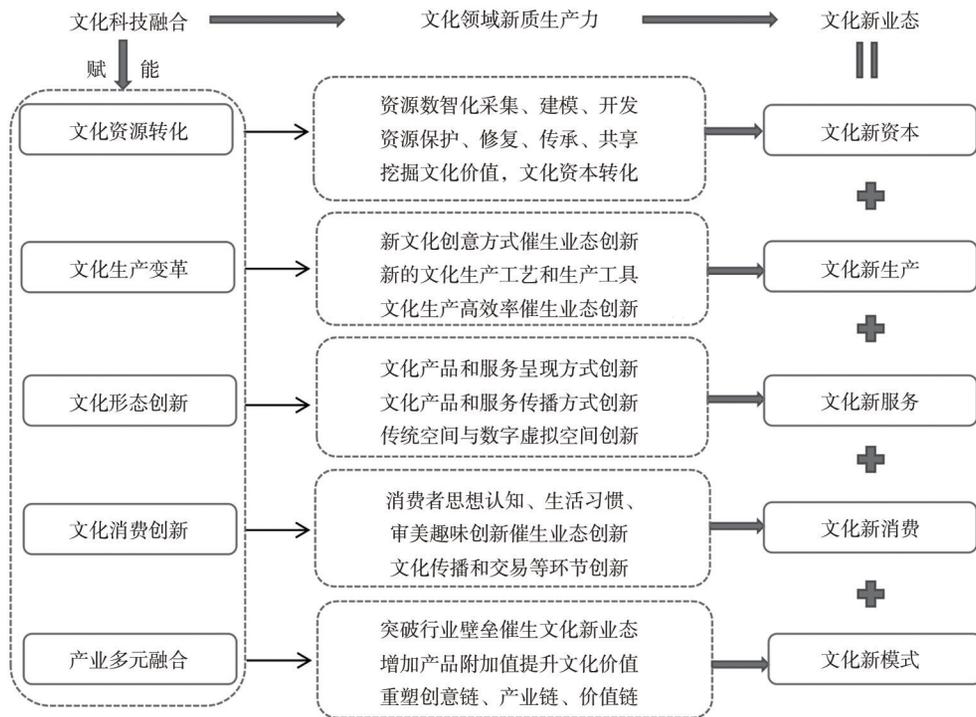


图6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文化业态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文化科技融合赋能资源转化

文化科技融合赋能文化资源的业态转化。借助科技手段对文化领域的图像、文字、音频、视频等资源进行采集、整理、存储、管理和保护,进而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首先,科技创新助力文化资源构建数智化采集、建模与开发流程,降低采集成本、缩短时间周期、提高采集精度形成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数据库,催生特定的文化业态。其次,科技创新助力文化资源的保护、修复、传承与共享,有助于高效率、高分辨率的文化资源信息的提取与阐释,营造文化资源的开发空间。最后,科技赋能挖掘文化价值,智能化提取文化元素,有效关联文化数字内容,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为场景化应用提供资源储备。通过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产品或服务再造,开发出新型载体和表现形态,将文化内容更加具象地融入当代审美、生活和价值体系。通过生产、交换等环节,实现其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文化科技融合赋能生产变革

科技创新对文化生产的赋能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流程及效率。文化创作、生产环节运用科技手段创造新的文化生产模式,进而形成新业态。第一,科技创新通过改变文化创意方式形成新业态。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创意的理解与重构,基于文化基因创作出新叙事,建立全新的意义结构,从而形成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新关联^①。例如,中国首部3A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其核心IP通过重

^① 花建:《新视听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构玄奘取经历史故事,与《西游记》文学经典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意叙事重建;创造中国电影票房神话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同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第二,科技创新通过改变文化生产工艺和生产工具形成新业态。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科技赋能文化生产,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例如,AIGC生成的电影《Our T2 Remake》颠覆了传统的编剧、导演、演员的创作形式,形成了从计算机直接到影像产品的生产流程。在技术迭代的过程中,传统业态的主要功能和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篆刻、书法等已成为纯粹的艺术形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第三,科技创新通过提升文化生产效率形成新业态。科学技术的迭代引发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随着工具、大机器、计算机等技术的迭代,文化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机器化、数智化生产不断催生新兴文化业态。

(三)文化科技融合赋能形态创新

文化科技融合赋能文化表现形态的创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交付环节,借助科技手段使文化内容体验更加生动,文化新业态形成。例如,演艺业从朴素的竹竿、火把、兽皮等自然置景,木制、皮制、纸张、绢帘等装饰布景,发展到声光电技术的专业置景,以及如今数字技术、虚拟影像的创意融合,推动演出不断呈现出更加生动的视觉冲击。如今,AI、XR、5G、全息影像等数字科技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和服务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营造出一个与文化资源的物理性存在相对应的数字化世界,使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演出、展览等文化活动。例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为游客营造了一个可以“亲眼看见”的良渚时期宫殿盛景,助力良渚文化突破时间和空间进行更生动的展示。

(四)文化科技融合赋能消费需求创新

在文化业态的变迁过程中,文化和科技相互融合创造出更多供需适配的驱动。消费者通常是被引导去追求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不了解也不习惯的新产品^①。文化影响了消费者的思想认知、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逐步培养新的消费习惯,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又影响科技创新的供给和完善。科技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刺激和改变,优化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传播方式,提升了消费体验,促进了新的文化需求的产生,推动文化业态的创新。例如,英伟达公司的硬件创新源于游戏显卡的消费推动;Ken Thompson对游戏Space Travel的喜好,促进了Unix操作系统的开发,也为苹果和安卓等系统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交易方式因新兴方式的出现而逐步衰落。新技术融入传播和交易环节中,新的创意融合了原本的文化优势与新的传播交易方式,新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刺激了消费者产生新的需求,更高的边际利润也刺激市场更多的生产追随者,形成新业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消费受到情感、情绪等非逻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更加突出,促使文化业态的创新更加注重从受众和消费者的体验感、精神需求和消费场景出发。消费者、生产者、传播者身份界限模糊,文化传播和交易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动态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创造和业态的迭代升级。

(五)文化科技融合赋能产业融合

文化科技融合构建的先进文化生产力,会通过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组织管理、生产流程等层面赋能于其他产业,实现突破行业壁垒,增加产品附加值,重塑了创意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②。如今,“文化科技+”模式已催生了沉浸式文旅、数字艺术乡建、3A游戏、短视频直播等新业态,形成了综合机械、工程、心理、医学、设计、娱乐交叉融合的未来娱乐设计产业。在拓展文化产业范围的同时,赋能旅游、乡村振兴、互联网及零售业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激发文化产业创新新动能,形成文化产业竞争新优势,构建文化生产新关系,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文化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出文化和科技相互赋能的系统性创新。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5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http://www.news.cn/2023-09/09/c_1129854063.htm,访问日期:2025年2月9日。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ies

Yang Kun¹ Li Xiangmin²

(1. Schoo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00, P.R.China;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Arts, Nanjing 210000, P.R.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riginates from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cross er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to tangible productive forces,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new industries, development models, and driving forces, constitutes the core el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cessitates the synergistic driving for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cross historical phases, transformations in cultural industries manifest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shifts in innovation actors, cyclical transformation, type transformation, and path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ater stage of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agricultural er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d a groundbreaking impact on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gradual separation of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labor enabled specialized cultural producers to emerge from agrarian communities,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al framework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industrial er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revolutionized cultural ecosystems, merg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with industrial systems to reshape methodologi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consumer markets, thereby displacing traditional model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evolves into an integrated and ecological form.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Cultural industries progressively dismantled industry barriers, forming a cultural ec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New cultural industries are emerging, characterized by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iteration and symbiosi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identity of innovative actors has dynamically evolved alongsid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artisans in agrarian communities to industrial capitalists and to post-industrial digital platform conglomerates, these actors reflect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dheres to life cyclical patterns—germination, growth, maturation, and decline—with historical surges in cultural innovation consistently preceded by waves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Typologically, shifts are categorized into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s (radical overhauls driven b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marked by emerging formats replacing obsolete ones) and adaptive optimizations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enabling coexist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format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ultural sectors has progressed from linear, unidirectional models to complex, integrated systems.

Study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ing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cultural productivity overcomes critical links in industrial innovation, forming an innovative community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reativity, resourc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scenarios. This empow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reform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forms,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thereby achieving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industry format; Cultural resour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郝云飞]